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雖然每期「三邊互動」只佔兩、三頁，但從最近的一項調查看，它深受讀者歡迎。我們希望有更多的讀者在看過新一期後，能投書本刊，及時寫下你短小真切的評論、意見和批評。

——編者

重新思考不同選擇的現代性問題

崔之元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當前的世界潮流中，認識上的普遍傾向是：種種關於不同選擇的現代性的理論和實踐都失敗了。而崔之元卻主張對這種普遍的認識重作歷史與理論的思考。我想這大概便是他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意思。這是基於中國國情的現實的思考。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實際上走過了一條不同選擇的現代化道路，形成了獨特的「文化霸權」。我們當然可以站在基本認同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立場上，來否定中國的不同選擇。但這樣一種認識論及立場本身，卻不能不受到新的挑戰和質疑。

25期上反駁崔的文章或隱或顯，差不多都在重申當下關

於「現代化」的普遍認識，這恰恰是崔文提出來重新審視的問題。現在問題是雙重的：一方面應該重新思考中國不同選擇的現代性與文化霸權，另一方面要反省當下流行的認識論與其他文化霸權的關係。譬如說甚麼時候「現代化」作為認識論上的首要問題，取代了「革命」、「解放」，而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權？

總之，崔之元提出的，乃是一個知識的社會學和認識論的問題。簡單地指責他「理論脫離實際」，雖省力氣，但於事無補。不如反思一下自身認識與理論框架所含的意識形態的封閉性，也許有助於把問題明朗化。

劉康 美國賓州

94.12.15

問題重重 何談創新

貴刊總第24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登載崔之元和昂格、崔之元先生兩文，提出的問題既大又多，其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假設、猜想和心理預期。從歷史上來看，人類社會大概永遠不會停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模式上。如果這樣，就有可能出現新的模式。但出現甚麼樣的

「新模式」，則有不同的可能，現在難以確定。兩文提出的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且又吸取了兩者長處的「制度創新」，只能說是諸可能中之一種可能。就這種可能來說，它在中國實現的可能有多大，則必須進行充分的論證。立足現在，中國改革的領導者們，首先沒有宣稱中國的改革目標是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反仍是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儘管其中有他們所說的「特色」，但最終還是「社會主義」。

如果我們不注重形式，而注重實際上的改革，那麼現在也看不出甚麼「制度創新」的特別優勢。對中國的改革來說，現在根本不是提出一種甚麼「制度創新」的時候，而是重在揭示其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並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方案」或「模型」。兩文對中國改革都抱有極其樂觀主義的態度，以此出發，討論中國的「制度創新」，極其危檢。實際上，中國面臨的問題或潛在危機是非常多的，現在要談的是如何「治病」，而不是去「超越」或「創新」。這種「創新」最好先在「發達國家」中進行試驗，不要把中國當作試驗的對象。

兩文把中國與俄羅斯的改革加以對比，認為中國是改革的成功者，俄羅斯是改革的失敗者。這種結論太簡單、武斷。俄羅斯改革中的問題固多，但即便如此，如果從政治、經濟、法治和思想文化四個方面制定出指標來對中俄改

革的現實進行全方位的比較，也難以作出上面的結論。而且，如果對不遠的將來進行預測或猜測，俄羅斯的改革前景倒更有理由樂觀。

王中江 鄭州

94.11.12

反思新傳統比反思舊傳統更重要

今年最後一期《二十一世紀》佳作頗多，「二十一世紀評論」、「百年中國」、「讀書」幾欄的文章都不錯。對我來說，特別感興趣的是陳海文先生的論文化啟蒙一文。

因為關於對啟蒙心態的反思，目前在大陸學界也是一個熱門的話題，比如不少後現代文化理論的批評家對中國五四以來的啟蒙話語作了一種後殖民文化方式的解構，認定它們都是西方的話語／權力體系。這樣的解讀自然有其道理，但不免過於籠統。正如陳先生的文章所分析的，即使是西方的啟蒙話語，也有德國的、法國的與蘇格蘭之分。它們之間學理和語境上的差別之大，一點也不亞於「東西文化」之間的差異。籠統地反思西方的啟蒙話語，有意識形態的意義，而無任何學術價值。作為一項嚴肅的思想史、文化史或文學史的梳理工作，更重要的是清理近代以來中國思想傳統中的西方不同學派的各自影響。比如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在啟蒙話語上主要接受的是法蘭西的啟蒙傳統，而對蘇格蘭的啟蒙思想十

分陌生；而在哲學思維方面黑格爾主義的影響又是根深柢固的。這一切對中國現代以來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至今這些傳統依然陰魂不散。許多知識份子儘管在理念上拒斥黑格爾，但依然不自覺地被它們擺布。我以為，講到批判反思傳統一類工作，反省這些近代以來形成的新傳統是比反思儒學這類老傳統來得更重要，因為它們比起後者更能根治直接地左右着當代大陸從知識份子、政府官員到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話語。

季林 上海

94.12.28

第25期是否太過尋找「經世」話題？

我發現第25期的人文內容似乎銳減，不無現實指向的政治—歷史內容卻驟然膨脹，再加上長長的「科技文化」的文字——於是擔心貴刊的辦刊方針是否有所調整？或貴刊是否太過於尋找或製造所謂「經世」話題？我總希望貴刊能多載些思考得較深些的文字，而少推出些只能激動一時的「話題」。從長遠的眼光看，這麼做，對中國文化建設反而有利。現在大陸學界不是有人堅執與高舉「學術規範」，力戒浮躁之風嗎？我覺得，「思考得較深的文字」總是較為「規範」，而為「話題」而推出的「話題」總是難免「浮躁」之氣。

中義 上海

94.12.14

談學術的規範與精神

目前，國內一些學人大倡

重建嚴格的學術規範，強調專業的學術研究。有些文章甚至對陳寅恪、王國維、陳垣等人學術研究背後的時代意識和道德感頗有微詞，對此鄙人實在不敢苟同。我極為贊成重建嚴格的學術規範，但要讓人在學術研究中不承擔起碼的道德責任，則未必妥當。這倒使人想起清初顧炎武和考據大師閻若璩的一段交往。閻若璩就常以自己能檢索出顧氏《日知錄》中缺誤而自得。但殊不知顧炎武之所以是顧炎武恰是其體用兼備，自成一貫；而閻若璩之所以是閻若璩，也是其拾遺補闕，考訂訓詁而已。究竟誰是大家，當一目了然。對於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竊以為還在提倡一種學術真精神，這還期望貴刊了。

胡成 南京

94.9.20

能否增擴「百年中國」篇幅

尊刊固然是一個綜合性的刊物，但從各期文章看，真正有分量的還是「百年中國」一欄。因此我覺得每期僅發兩篇文章似乎有點偏少。而且從目前中國的各種問題之癥結看，似乎又都與百年來中國的選擇有關聯。從這個意義上說，重新解釋百年來中國人的選擇和失誤，不僅具有學術上的意義，而且可以實實在在為國人提供一些借鑒。中國近代史上的所有問題似乎都值得重新加以檢討，故而希望「百年中國」能增加篇幅，發揮作用。

馬勇 北京

94.11.8